

『双一流』建设要的是引领世界的中国大学

许宁生

一所大学应该有怎样的历史担当和时代担当? 当中国正在从一个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 是否有一流的高等教育能够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可靠的、源源不断的“高精尖缺”人才? 是否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去研究真正的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 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每一位教育者的重任。去年年底,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今年年初, 国家又出台了“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总书记思政会上的讲话是纲领性的, 意义重大而深远。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在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指引下, 紧紧抓住思政工作这个根本, 把握好“双一流”建设大方向。“双一流”建设国家投入很大, 把握好大方向极其重要。

我首先觉得,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要有中国自己主导的目标体系。总书记要求, 高校在确定世界一流建设目标时要有“中国特色”。过去讲一流, 就讲“对标”。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是重要的, 但应该避免陷入“对标”陷阱, 而要大大提升“引领”世界这一思想境界, 应针对“世界一流”的目标内涵及可考核的指标, 提出我们的内容。有三点特别重要: 一是应高度重视和坚持中国特有的内涵; 二是应积极创新中国在世界上有共识的内涵; 三是应扩大在世界已有共识的内涵方面的中国影响。总之, 要把中国特色跟世界一流目标融合在一起。

为此, 中国高校应不断发展学科体系, 适应“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需求。主动去满足这些需求, 就能把中国高校的学科体系做大。因此, 一边要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开展建设, 一边要大力拓展学科前沿和架构。当前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可以为学科体系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一是我国到 2030 年时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前沿科学与未来技术特别重要, 可以解决没人提供给我们、特别是世界上都没有的科学技术, 这应该作为一个新增的学科板块。因此, 复旦正在谋划相关的学科建设部署。

二是在大力弘扬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 我们要有新思想, 新思想从提出到进入教学, 学科建设内容很丰富。另外, 我国大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案例, 还没进入教材, 还没上升为理论。总之, 在哲学社会科学板块也要有新的结构性安排。复旦正在部署马克思主义学科群、中国式现代管理学等, 因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等, 应该成为强大的主流学科; 复旦正在建立人文科学评价体系, 因为我们认为与我们的文化相关的学科应该越来越强大。

三是在健康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 我们正在谋划一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建设, 解决上海乃至中国的健康问题, 如老年、儿童的问题。

其次, 育人要成为“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内容。我认为, 国家对本科教育要有足够投入, 让进行“双一流”建设的大学接收更多的本科生, 让更多的中国孩子、更多的西部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享受一流高等教育。研究生培养要更多地服务国家“高精尖缺”人才计划, 主动为供给侧改革, 为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提供高层次创新人才。此外, 思政教育要贯穿所有学生培养的全过程, 覆盖全方位。因此, 一方面在高校内应该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思政课的建设的投入, 另一方面, 全社会应该为高校培养人才提供育人资源。国家要对此出台政策, 甚至作制度性保障。我们特别希望更多的社会文艺团体走入校园, 希望更多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积极敞开大门, 接受更多师生前去挂职锻炼, 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高校思政工作的合力。

最后, 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探索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在复旦大学的办学实践中, 我们深切体会到, 高校治理体系必须突出抓好“三条线”, 一是巩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条“中心线”, 二是强化院系党的领导这条“中场线”, 三是激活党支部工作创新这条“生命线”, 并且做到“三线联动”。以此为基础, 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架构、学术治理架构以及校院两级管理架构, 从而保证党的领导在学校工作中全面发挥作用。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还有很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不断实践。

(作者系复旦大学校长, 本文为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发言, 本报记者黄辛整理)

对话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

人才培养的“工程环节”需进一步打通

■本报记者 陈彬

“我国已经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与国际工程教育认证实质等效, 这对我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如是说。

除院士和校领导身份外, 钱锋还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 在连续几年的两会上, 他也一直在关注国内高校的工程人才培养的问题。今年两会, 钱锋递交了一份关于优化工科教师结构的提案。记者与他的交流也从这份提案开始。

缺乏工程人才流动正常渠道

《中国科学报》: 您认为目前国内工科教师结构存在什么问题?

钱锋: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 具体到工程人才培养方面, 由于学科特性所致, 要求相关教师具有一定的工程实践和意识。但遗憾的是, 目前国内相关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意识普遍不足。

2010 年, 教育部启动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提出要引进有丰富工程经历的教师、工程专家到学校任职, 实行“卓越人才”“双导师制”。但据一项针对 52 所不同地区和类型高校的实证调查显示: 地方本科院校中, 有全职企业经历的工程教师只占工科教师总数的 47.95%, 在“211 工程”和“985 工程”高校中, 相关教师的比例甚至不足四成, 虽然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工科教师从事过与工程相关研发项目, 但绝大部分教师的工程实践止步于实验室模拟, 没有参与产品设计—原型—生产的整个过程。

要解决这一问题, 一方面需要安排更多的教师进入企业。同时, 我们更应该从企业直接引进经验丰富的工程专家。但遗憾的是, 目前企业人才进入高校面临着很多制度性障碍。

《中国科学报》: 您所指的制度性障碍是什么?

钱锋: 当前, 国内高校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各种大学排名又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了论文发表和影响力因子高低的重要性。因此, 高校工科教师的招聘也特别关注应聘者的院校与学位等级、论文发表情况, 是否有工程实践经验反倒不能成为录用的主要决定因素。这就成为了企业人才进入高校的一道门槛。

即便有企业工程人才进入了高校, 由于目前对于工科教师的考核评价政策导向和指标权重也偏向科技论文的发表, 对教师工程的实践能力缺乏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 教师职称晋升的关键因素也依然是论文发表, 这就使得工科教师们更加淡化了工程实践意识, 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和对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就更加弱化。鉴于此, 一些真正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也难以有用武之地。

高教观点

四六级考试, 学生应有选择权

■熊丙奇

近日,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将取消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消息引发公众热议。该校 3 月 17 日回应称: 取消英语四六级考试只是学校的工作计划之一, 尚未正式形成制度, 英语四六级考试由于由教育部门主导, 变为所有学校都被要求组织学生参加的考试, 而为了促使学生在这统一测试中考出好成绩, 不少学校将四级考试与学位授予挂钩, 这使通过四级考试成为学生学习英语的首要目标, 大学的英语教学也围绕提高四级英语考试成绩而进行。

因此, 大学决定不统一组织学生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 这属于大学的自主权。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下一方向, 就是将这一测试变为社会化考试。这就让考试为学校的英语教学, 或学生测评自己的英语能力服务, 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行政性质的教学指挥棒。

之前, 我国针对英语四六级考试存在的问题启动了考试改革, 包括不再发合格证书、优秀证书, 只给成绩单报告单, 希望以此淡化合格率、优秀率。但对于该考试还是由行政主导, 因此对于考试成绩, 有的高校还是会划出一条合格线; 还有的高校直接把四级考试成绩作为学习英语的最终考试成绩, 于是变相将四级考试与授予学位挂钩, 这令英语四级考试一直摆脱不了是该继续保留还是该废除、取消的争议。

目前, 我国正在研发统一的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据报道, 新制定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将划分为九个等级。对此, 有解读认为, 随着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的推出, 原来针对大学生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将被国家英语能力考试替代。但很显然, 如果不改变考试的组织形式, 仍旧由行政部门主导, 统一要求所有高校都组织学生参加, 那么, 存在于英语四六级考试中的问题也会继续存在于国家英语能力考试之中。

从根本上说, 我国的考试改革都需要坚持社会化改革的方向, 即考试由社会专业机构组织, 学生自主选择参加, 有关机构自主认可, 这就让考试发挥评价作用, 而不再由行政干预。以此观察云南这所学校的做法, 取消对学生提出的



换言之, 我们缺乏企业工程人才向高校流动的正常渠道, 这是造成工科教师结构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教育是国家的教育

《中国科学报》: 众所周知, 工程人才的培养需要企业的配合。除了您提到的人才输出外, 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也是重要内容, 但似乎目前国内企业并不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

钱锋: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 国内工程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是可以直接到工厂完成的, 那时, 学生毕业后是可以直接到工厂开设备的, 但现在的学生能亲自到车床上操作的机会都很少。

其实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并不复杂, 因为国内企业没有接收工程专业学生实习的义务, 而且一旦接收学生来工厂实习, 企业就必须承担一定的安全责任。因为一旦出现某些问题, 其责任也很难理清, 这就导致了企业在接收工程专业学生实习的问题上缺乏动力。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企业为高校培训教师工程能力上。企业为学校提供先进设备、资金, 使教师获得最先进的工程知识, 但企业的培养在经济和社会声誉方面获得什么? 况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诸多棘手的问题, 诸如

专利保护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 这些都使得很多校企之间在人员培训方面的合作名不副实。

《中国科学报》: 您认为问题该如何解决?

钱锋: 在教师培训方面, 当然是制定相关政策, 为企业实践的提供教师提供相关支持, 同时保障企业合理合法的利益需求。

在学生实习方面, 我们需要明确一个观点, 那就是教育是国家的教育, 而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教育。国家相关部门都有义务支持教育工作。只有各部门打通, 形成合力, 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真正起到作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建议国家应该统筹包括发改委、国资委、工信部等在内的各部委, 出台具体政策, 划定企业必须接受实习生数量指标, 以此对企业接收工程专业学生进行相应的规定。

学生培养应具连贯性

《中国科学报》: 您认为在工程人才培养方面, 除了校企之间的很多渠道没有打通之外, 高校内部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

钱锋: 高校内部在某些制度设置方面, 的确也有可以商榷之处。比如, 我们可以允许硕博连读的情况出现, 甚至在诸如医学等领域, 可以招收本硕博连读的学生, 为什么在工程教育领域, 我们不能将本科和硕士之间的通道打通呢?

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笔账: 目前大学本科为四年, 工程类专业硕士一般为 2~3 年。因为这两者之间没有打通, 学生需要利用大四一年的时间准备毕业论文和考研, 而在硕士阶段, 因为与之前本科课程存在衔接问题, 导师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补课”, 这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浪费, 如果能够打通本硕环节, 学生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到企业实习。

据我所知, 在国外一些国家, 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需要五年时间, 其中, 学生在企业的实习时间可以长达一年, 我们如果能做到本硕环节打通, 也可以做到让学生拥有一年的实习期, 这对学生的成长将大有裨益。

《中国科学报》: 您似乎非常重视学生整个工程教育体系的连贯性。

钱锋: 学生的培养, 尤其是工程专业的学生培养, 的确需要一个相对连贯的过程, 但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考虑, 比如一些针对性的培养。

在这方面, 我们也有些政策是可以调整的。例如, 既然我们可以将硕士生分为工程型硕士和学术型硕士, 并采用不同的培养方式, 为什么在一些行业特色类高校中, 不能将博士生也进行“学术型”和“工程型”的划分呢? 要知道, 在 2011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已经设置了工程博士专业学位, 并且有 25 所高校也已经获得了学位授予权, 目前应该考虑将此计划拓展到诸如地质、矿业、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行业特色高校, 而这些院校恰恰是工程类人才培养特色最鲜明的高校。他们也相对更加适合此类人才的培养。

总之, 在整个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中, 无论是师资水平的提升, 还是学生培养方式和手段的改进, 都需要加强各环节之间的沟通与配合, 而要做到这点, 需要上至国家管理部门, 下至各企业的共同配合与支持。

记者快评

高校心理工作为何『不得人心』

■陈彬

近日, 某公益基金联合其他机构在京发布了一份《中国大学生成长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显示, 当前高校中, 有 95.7% 的大学生存在迷茫和困惑, 其中大一和大四学生更为明显。

高校学生在初入高校和即将毕业时, 有些心理上的迷茫, 这是一件都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如此高的比例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在笔者看来, 白皮书上还有一个数字同样令人出乎意料。那就是在面面对成长问题时, 有 90% 以上的大学生会选择“专业学习机构”或者去问有经验的学长学姐和行业专家(即“过来人”), 而不会选择老师或辅导员。

之所以说这一数字同样令人吃惊, 是因为近些年来, 国内高校普遍加强了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测, 大量教师和辅导员也被赋予了随时留意学生心理健康、及时排解学生心理问题的职责, 有些学校面对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学生, 甚至做到了“一对一帮扶”。然而, 学生们在遇到类似问题时, 首先选择的却依然是“过来人”。

在帮扶有心理问题学生的工作中, 为什么高校的工作如此“不得人心”。

在笔者看来, 高校的相关工作不可谓不认真, 但“认真”并不代表着“走心”。换言之, 高校很多老师在这方面其实是在很认真地做一些表面工作。以找学生谈心为例, 试问, 有多少老师真的认为仅仅通过几十分钟的聊天, 学生就可以真正敞开心扉, 向老师倾诉自己内心深处的纠结?

受中国传统师生关系的影响, 在中国学生的心中, 老师始终是一个“父辈”的角色, 也因此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和戒备心理, 而要消除这种心理, 必须打破师生间的“辈分”限定(当然, 只是在特定情况下)。为此, 老师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学生相处, 彼此频繁交流, 使学生从心底对教师产生认同感。

但是, 目前高校老师和辅导员们有如此多的时间吗?

必须承认, 人力不足依然是困扰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因素, 更令人尴尬的是, 这份工作对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还相当高。因此, 对老师的培养成本也会比较高, 当学生心理健康并不是众多高校排名的参考因素时, 学校是否有魄力在这方面花费更多的资金和精力, 也就成为了考验高校领导者的一道难题了。

域外传真

缩短学制可能会冲击高等教育

■鲁思·麦基 哈罗恩·西迪基

日前, 英国政府受到警告: 缩短学制的计划会使大学每年学费变得更高, 同时也不利于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英国政府提出的两年学制将与三年学制的总学费相同, 这意味着两年学制每年学费更加高昂。同时, 部长们正在讨论取消高校每年学费 9000 英镑的上限, 让高校可以收取更多的利润。

事实上, 早在官方正式宣布之前, 人们就已经对如何保持教育标准和保证学制工作量议论纷纷。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UCU)表示, 从目前看, 这个提议的目的更像是帮助急需盈利的公司发展高等教育领域, 而不是高校向更多的学生分享知识和经验。

UCU 秘书长萨利·亨特则指出, 原本缩短学制的唯一好处就是学费降低, 但从目前形势看, 似乎各方面都没有这个计划。

“高校的声誉是建立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之上的, 而缩短学制破坏了它。”萨利说, “除了给学生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外, 这种新学制只适用于那些一年到头都在学习的学生, 因为缩短学制必定会缩短或是取消寒暑假。我们的大学的确是学习的地方, 但不应该是学术的血汗工厂, 政府应该抵制高校和教师采用这种方式教育学生。”

英国 24 所顶尖大学组成的罗素集团也表达了对快速学制的担忧。罗素集团执行董事蒂姆·布拉德肖博士表示, 尽管教育模式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很重要, 但是这种全职三年学制更适合于研究密集型机构, 而不是广大学生。

英国教育部强调, 快速学制与目前本科教育模式相同。若将学生的三年学制削减为两年, 每年学费可能会超过 13000 英镑。当然, 高校必须保证这种快速学制学习的内容与传统学制别无二致。

对此, 英国工党大学发言人戈登·马斯登质疑: “每年超过 13000 英镑的费用是否能被广大学生家庭所接受? 对已经很努力工作的家庭有什么影响? 缩短学制真的对学生有益吗?”

据悉, 两年学制是由英国保守党推广的。有些人认为, 该制度虽然会使学费更高昂, 却也能激发学生减少住宿和平时娱乐的开支。英国教育部长乔·约翰逊也表示: “该法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和灵活的学习方法。学生们迫切需要更灵活的课程和学习模式, 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适应工作和生活。快速学制使他们能够迅速进入职场或重返工作, 同时, 这些课程也给他们教授了工作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英国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马达拉引·安塞尔说: “快速学制对于各方面技能已经成熟以及希望快速进入就业市场的学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

的选择。我们已经通过试点, 运行出了一批成功的快速学制案例, 在这些案例中, 学生并没有支付高昂的学费。同时, 因为学费的灵活性, 高校也可以更自主地进行课程安排。”

(作者系英国《卫报》记者, 阙凤云编译)



图片来源: www.quanjing.com